



◎审美课堂

讲述国歌背后的故事，从国歌历史中体悟雄壮之美、精神之源——

永远嘹亮的奋进号角

李涵 左曼丽

国歌从淞沪抗战的前沿唱响

“一·二八” 淞沪抗战，十九军血战长城，有进无退，十九军淞沪迎敌，奋不顾身。1932年2月，身处上海的秘密共产党员聂耳与田汉等党领导的左翼文化人士，一起去前线慰问抗日军队，他们演唱的《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柔情似水，让伤员们焦躁不安。看到这种情形，聂耳唱起了激情澎湃、节奏鲜明的法国国歌《马赛曲》，这首充满着战斗气息的军歌，立刻受到战士们们的欢迎，精神为之一振。这让青年作曲家聂耳萌生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的强烈愿望。

1935年2月，由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将军投拍的电影《风云儿女》进入创作阶段，田汉担任编剧，并且完成了主题歌歌词的创作，聂耳主动承担了为主题歌谱曲的任务。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引起了巨大轰动。电影散场了，观众却高唱着“起来，起来，起来”久久不愿离去。从此以后，《义勇军进行曲》不断在中国大地传唱，无数抗战将士就是唱着这首歌，以血肉之躯驱回疆场。

新中国筹建之初，1949年7月，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和各界人士一道，兴奋地为新中国商定国歌，在600多件国歌征集稿中，《义勇军进行曲》一举夺魁。但也有代表提出，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周总理则建议就用原词，最终，毛主席拍板说：“我们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所以，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同。”于是，《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新中国的代国歌。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从天安门广场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中国，传播到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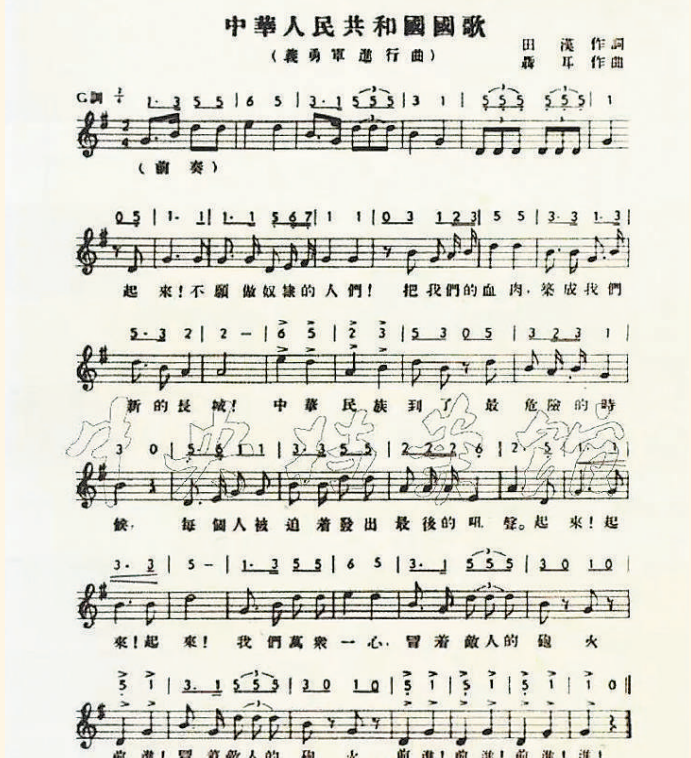
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曲折，是无法磨灭一部伟大作品的魅力的。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全国人大正式确定我国的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国歌塑造上海的精神高地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声音形象，更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和集体意志的坚定表达，它凝结着民族文化的传统，上海唱响，《义勇军进行曲》塑造的精神高地，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感悟——

其一，国歌让人们永远耳闻嘹亮的奋进号角。

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共84个字，字字千金；整首曲子只有37小节，46秒，但每个音符仿佛都在发出冲天怒吼。其前奏很短，只有五



个小节，却出神入化地出现了三次三连音，它像机关枪的发射，又似奔腾的马蹄声，催促着每一个中国人投入抗日的战场。接下来坚定有力地呼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立刻让奋起抗争的情绪仿佛瞬间就汇聚成了澎湃洪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警句，聂耳在这里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并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运用了一个八分休止符，让“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一下子点燃人们胸中的熊熊烈火。连续出现的三个“起来”，在旋律进行的音势上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强烈。“起来！起来！起来！”催促人们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歌曲的结尾“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这一动词重复三次之后又落在一个“进”字上，象征着上前线的步伐铿锵有力、一往无前……

正是因为歌曲中包含着如此强烈的战斗性元素，才使我们的国歌始终像战斗的号角、奋进的擂鼓，让我们每一次唱起国歌，都能够血脉偾张，充满无穷力量和必胜豪情。

其二，国歌让人们在音乐美中赓续民族的文化血脉。

我国的国歌是创造性运用中华民族传统元素的一个典范。

从曲调看，国歌用的是中国曲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乐感特色，是民族性情的音乐体现。中国曲调中的“宫商角徵羽”五音，作为中国古乐基本音阶，早在距今2600余年的春秋时期就已形成，之后被广泛

运用于音乐创作，塑造了中国音乐“含蓄、优雅、轻快、刚柔并济”的独特风格。我们的国歌正是用这五个音谱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青年作曲家聂耳深厚的民族音乐修养以及坚定的民族音乐自信，也使中国人一旦唱起，就有一种天然的心声相通、情感相融，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歌词看，国歌最突出的意象就是“血肉之躯筑成的新的长城”。长城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奇迹，是中国精神的最高物质表达：它高大、挺拔，绵延矗立在群山之巅，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恢弘辽阔、气吞山河；但是，它又是依山起伏、阴阳分明的，代表着中华民族顺应时势、坚守正义，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道义立场和坚定意志。所以，“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从民族

心理的最深处，立起了为正义而奋起抗争的目标追求，把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表达得深邃浩荡、淋漓尽致。

正因为国歌从词到曲，都传承着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基因，浸润着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滋养，才使我们每每唱起，犹如亲人相诉、同胞相拥，思想和感情在融汇中不断升华，生出万众同心、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

其三，国歌让人们始终心怀人类的休戚与共。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不仅很快在抗日的最前线、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得到传唱，而且也很快被其他国家的人们所接受，成为不朽经典。

抗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被苏联、法国、捷克等许多国家翻译成不同语言，而且还灌成唱片广泛传唱。在西方，第一个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是美国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1940年的一次草坪音乐会上，面向上千人，保罗用中文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他在接受采访时饱含深情地说：“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多学几支中国歌。我要把这么好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受压迫的人听！”1944年马来西亚游击队也把《义勇军进行曲》照搬过去，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成“马来亚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很多马来西亚的烈士是唱着这首歌就义的。

二战结束前，有文化学者编了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歌曲选，《义勇军进行曲》位列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世界性歌曲，它不仅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深重苦难，唱出了所有被压迫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共同心声，而且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期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自由，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国歌的神圣与尊严，来源于它与国家、民族内在而深刻的关联性。这种神圣性既具有共同体意识和意志的鲜明特征，又具有生动而鲜活的个体体验感。

国歌蕴含着战斗性、民族性、世界性、神圣性的精神内涵。奏唱国歌成为我们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必不可少的“升腾瞬间”和“高光时刻”。无论何时何地，国歌响起时，总能激荡起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和当年的那些纯真明快却一直鲜活地留存于记忆里。

说到此，好像围炉的乐趣不是取暖就是吃喝。自然啊，饱与暖，人之大欲存焉。你看，诗人白居易说得很直白，“绿蚁新醇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几句的影响力大得出奇。一到冬天，下没下雪，喝不喝酒，大家都喜欢念叨念叨这首诗。也不一定非要喝酒，喝茶也是极好的。南宋杜小山写道：“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主客围炉清谈，品茗赏梅，雅。

能不能再雅一些呢？当然能！在解决了饥与寒这样的大困之后，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自然就高大上起来。回头来看，“围炉夜话”这四个字其实是有出处的。《围炉夜话》原是一部书，清朝王永彬所撰。寒夜围炉也并非为了煮酒烹茶，而是一位长者带领一家人谈文论道。“岁晚务闲，家人聚处，相与烧煨山羊，心有所得，辄述诸口，命儿辈缮写存之，题曰围炉夜话”。此书谈叙生活，品味人生，行文浅易，说理精警。聊列两条于此，可窥斑见豹。“士必以诗书为性命，人须从孝悌立根基。”

“处世以忠厚人为法，传家得勤俭便佳。”由此可见这本书的立意多在弘扬为人处世之道。

如此一说，围炉的意境立马升华了。不过，一提到围炉，我还是会油然想起那些小温暖、小零食，那些旧时光里的小美好。

（作者系江苏省盐城中学教师）

◎大家谈美

所有的想象力、思想力、创造力，其根基都在于审美力——

教育，对永恒价值的追寻

傅国涌

教育到底想寻找什么？教育不是要寻找一路上遇到的小花小草——虽然这一切也都是美好的，而是要寻找那些确定不变的价值。

与胡适同时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不赞同胡适在中国提倡白话文，也不认可其相信的进化论。在梅光迪看来，进化论是浅薄的，人类的历史并非进化的历史。他说：“在有能力应对现在或是未来的生活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

“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其实就是教育的大道，就是教育要寻找的确定不变的价值。

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说，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古今中外无数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都想要解开这个谜，而通过教育，这个谜才有可能真正解开。

教育要培养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人。这是爱因斯坦1930年在《我的世界》中说的——“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人”。

就是让一个人通过教育提升和这个世界对话的能力，与自然对话，与历史对话，与社会对话，与自我对话，小花小草小虫小鱼……世界万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对话对象。如果你是法布尔，便与昆虫对话；如果你是牛顿，便与宇宙对话；如果你是凡·高，便与田野和向日葵对话……不同的人只是使用不同的语言，牛顿用的是物理的数学的语言，凡·高用的是绘画的语言，贝多芬用的是音乐的语言。最常用的语言当然是不同民族使用的口语和书面语，法布尔的《昆虫记》是法语写的，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用英语完成的，通过翻译，汉语世界的人照样可以分享他们的发现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只有一种语言。

教育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彼此成全，互放光亮。

教师与学生之间，校长与教师、学生之间，甚至学生与学生之间，能不能互放光亮决定了教育的品质。

教育有着更崇高的目的，这个目的是精神性的、超越性的。

如果把“彼此成全、互放光亮”拆解为四个层次，教育最终要造就的人是什么样？一是具有化空间为时间或者化时间为空间的能力，这是一种想象力。二是从“坐井观天”变成“天观井”，这是思想力。三是从“有中生出”到“无中生有”，这是创造力。“有中生出”相对容易，但“无中生有”就难了，教育就是扩展这种可能性。从“有中生出”到“无中生有”，这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创造，凡·高的向日葵是无中生有，李白、杜甫的诗是无中生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无中生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无中生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无中生有。

而所有的想象力、思想力、创造力，其根基都在于审美力。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没有审美力，长大了也不会有想象力、思想力和创造力。没有审美力，便不知道什么是好看的，他只能像“马二先生游西湖”（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4、15回写“马二先生游西湖”），马二的眼睛看不见西湖的美景，只看见西湖的美食，一路吃遍了各个小摊，吃到撑肠拄腹，这是没有审美力的一种表现。

少年时，我读东晋陶渊明的诗，读到“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从易水想到荆轲，空间在这里化作了时间。再读初唐骆宾王的诗《易水送别》，“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时间又化作了空间，与陶渊明异曲同工。

到了近代，葬于西湖孤山脚下的和尚苏曼殊写道，“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他也将时间转成了空间。“一天明月白如霜”，是他亲眼所见的空间。

杜甫最擅长时空互换。“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便是典型的时空互换的诗句。小时候，我背诵他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连接着“生长明妃尚有村”，原来王昭君就生在这个小村子里，从汉到唐，千年只是一瞬间。时空相互转化，在伟大的诗人手里，时空就像悠悠球一样在转动。

我19岁时，我的老师吴式南先生告诉我，广州有位画家叫李正天，曾经提出五维空间之美——

一维是直线美，二维是平面美，三维是立体美，四维是时空中的运动美，五是心灵自由组合的梦幻美。

而我的老师继续向前，当时就提出还可以有六维空间之美和七维空间之美。六维是什么？是零维的“点”的美，七维则是“空白”本身的维外美。这让

我脑洞大开，一生受益。

吴式南先生是“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弟子，在院系调整后之江大学幸存的文科（当时叫浙江师范学院）读书时，夏先生教他古典文学，他还是课代表。蒋礼鸿、姜虎夫等也都是他的老师。他一生不幸，教我时已50多岁。他生平只出过两本书，唯一的专著是前几年出版的《发现艺术之美》。

他没有将“六维”“七维”写进这本书，是在发给我们的讲义里提出的。那时，我的世界一下子便打开了。我从他提出的“空白”本身的维外之美，相隔30年，我想出了自己的教育“留白”论，起源就是他的七维空间之美。

语言的背后是思维，思维的呈现是语言。从本质上讲，教育就是要启发一个孩子打开思维，让他的思维“无限”。

而我们总是活在有限之中，生命是有限的。人世间的种种都是有限的，谁也超越不了肉身的限制，但是，教育可以。

教育通过什么来打开无限的门？通过思维，通过想象，通过创造。孔夫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凡·高、塞尚、鲁迅……每一个在自身领域打破人类思维限制的人，就变成无限。

所谓无限，不是肉身的天长地久，而是思维超越了时间给予的限制。

1987年，吴式南先生来我家里，对我说了一句话——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他预言，到21世纪，在所有的学科中，人类最值得关心的是教育学，当然迄今为止，这个领域还没有产生哥白尼式、康德式、牛顿式的人物。

当时，吴先生还跟我说了一个观点——“教育学是人学”。那时，我20岁，他55岁，我懵懵懂懂，只是把它记了下来。现在，我理解了，“教育学是人学”，这一论断是多么精准。

德国学者狄尔泰说过一句话，“生命本身即流逝着的时间性，是以形成永恒的意义统一体为目标”。生命本身在不断流逝，时间流过你的身体，但必须要以形成“永恒的意义统一体”为目标，活着才有意义。

人类共有—个心灵，教育就是要让每个孩子的心灵融入人类的心灵中，不再孤立于人类之外，用最好的语言（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科学的）将自己的心灵表明出来，分享给其他人。

在日复一日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将融入“永恒的意义统一体”中，也就是“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这是教育的价值所在，是对不断变化的时间的抵抗。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曾说——无限只能通过有限来领会。有限仍有意义，作为有限的人，我讲了一些有限的话，但我的目标却是指向无限的。

（作者系历史学者，著有《开门见山》等）